



「『與其咒詛黑暗，不如燃燒自己。』蘇恩佩女士一句名言，曾經喚醒了不少基督徒，不可單為社會敗壞的風氣嘆息，更當付出代價，讓基督自己的光芒，在我們的生活行為中照耀出來。」這是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的蕭壽華牧師在香港明光社籌組時所寫的。明光社是為針對黑暗的世代，批判社會問題，履行對城市的承擔而成立的，從上述的一段文字可見，是受到蘇恩佩的生命所影響。這位看起來弱不禁風，說話溫和婉柔的女子，卻有堅韌無比的生命力，在上世紀的60年代以至80年代初，分別在台灣、新加坡和香港，以先知的觸覺、實際的言行，為青少年福音工作，燒盡了自己的生命，也影響了無數的生命。

懷抱理想

蘇恩佩生於香港，長於香港。她中學時期就讀於著名的英華女校，這是一所西教士所創立的學

校，她就是在學校裡信主。中學畢業後，順利考入香港大學，這是當時香港唯一的高等學府，但她決心作育英材，轉而進入羅富國師範學院，畢業後選擇在偏遠的荃灣區當小學老師。可見，她服侍青少年的心由來已久。

就任小學教師期間，她罹患重疾，把甲狀腺切除了，又接受放射線治療，之後要長期服藥，並因此一度暫停教學。她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，對人世間也懷抱著理想；她愛人，尤其愛青少年。所以，疾病未能困住她，當病情受到控制，身體逐漸健壯後，感到要有美好的服侍，便要進一步受裝備，遂赴美國伊利諾州惠敦大學攻讀文學。在文學的天地裡遨遊，開懷地汲取騷人墨客的生命精華，她悲天憫人的心腸更得以抒發。就在這時，她強烈感到海外華人漂泊無根，對未來茫然，不知何去何從；知識分子雖事業有成，生活安逸，卻情無所依。從她所寫的幾篇小說如《仄徑》《黃昏過客曼克頓》等，

都可以看出她的傷感。於是，她決定回到需要她的中國人中間，貢獻所有。

1966年，她離美赴台，完全投入台灣的校園福音工作，並擔任《校園》雜誌的總編輯，也使這份刊物轉型為「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刊物」。在台灣四年，她稱這是「很美的四年」，在所寫的〈小樓閒居的日子〉裡，她如此道：「我們接觸的對象正是那些易感的心靈，他們的心扉熱切地向真理開啟……我們之間建立了很美的關係，往往是深遠長久的關係。台灣的四年是很美的四年，很充實又很美的四年(是一根蠟燭的自焚)。很充實又很忙(我平均每晚睡四、五個小時，也有通宵徹夜不眠的日子)……《校園》在我手中經歷了大革命：它的內容和形式都經過刷新，它吸引了更大量的讀者、更精英的作者，它激起了更熱烈的討論、更投入的參與。這一切都是令人鼓舞、令人興奮的……」她對當時所流行的存在主義以及基督教圈子裡的一些弊病，都很不以為然，透過文章、輔導、小組及各樣的聚會，把很多迷失方向的青年重納正途，尋得真理。然後，也在1970年代初赴新加坡，在當地創辦了《前哨》雜誌。

正如她所說：「長期的熬夜、精神的透支總有該償還的代價」(〈小樓閒居的日子〉)。1970年她經歷了一次大病，這一次的「大崩潰」使她知悉自己已患上癌症多年。雖受到病魔的嚴厲煎熬，但她對生命仍充滿熱誠，寫下了很多感人的作品如〈只有祝福〉、〈仍是祝福〉等(其後輯成《死亡，別狂傲》一書)，鼓勵了很多對生命感到灰暗的朋友。她以為自己的路已走到盡頭，「大限當前，對生命豈輕忽」；未料，她返港治療竟揭開生命的另一個高峰。

蘇恩佩離開香港快十年之後，回到她的「第一家鄉」——香港時，有很深刻的體會，她這樣寫道：「這個城市發展得這麼快，已經變得很陌生了……而令我們驚心悚目的是大多數罪犯的年齡都在二十一歲以下，這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！」她在想：『我能為這城市做甚麼？』——我有的只是病弱的身軀和一枝禿筆。不，我有的更多——只要我真的相信『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』……不是嚴峻法令，不是二十丈高的監獄圍牆，只有福音的大能，才能把我們的年輕人從罪惡

的捆綁中釋放出來……」(〈我能為這城市做甚麼？〉)她揮筆直抒，寫了一系列的文章，以先知式的筆鋒批判社會，喚醒散渙的人心。從這些文章，可以看到她對時代的悲情，對人的承擔和盼望，更看到她對信仰的執著。

突破運動

二十世紀70年代的香港，社會正急劇轉變，傳統價值觀逐漸瓦解，未有健康的新理念來代替，青少年無所適從，茫然失落於物質與金錢的崇拜之中，罪惡暴行不斷增加。蘇恩佩目睹，一份難以言喻的感覺油然而生，她為這城市哭泣，要尋求挽救局面、衝破桎梏的可行途徑，要為這城市的作鹽和光。

蘇恩佩與一些海外學成歸來的弟兄姊妹，彷彿聽到笛子的呼喚，彷彿感到一股力量在召聚，一起禱告，一起等候，一同呈獻自己僅有的，不受資源和設備的限制，一份雜誌就這樣誕生了。《突破》於1974年1月正式面世，這是香港第一份以青年為對象、公開發售的基督教刊物，這亦展開她委身服侍香港青少年的新里程。數年後，在蘇恩佩的催生下，以青少年為對象的《突破少年》亦面世了。關心青少年的「突破運動」，從此不僅在基督教圈子，亦受到香港社會各界所支持，影響所及，海外華人教會和社團，也開始關注青少年問題。

在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(FES)的網頁，由柯子明所撰寫的簡史中，關於70年代的發展，有這樣一段的記載：「……這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『突破』的成立。當時蘇恩佩、蔡元雲、詹維明，以及梁永泰等人，為了回應當時青年人的需要，在1973年創辦《突破》雜誌，其它『突破運動』的組成部分(例如影音中心、輔導中心、《突破少年》等)，亦在其後數年相繼成立。當時突破的異象是希望藉文字及大眾傳媒，以潛移默化的方式，表達基督徒的價值觀，挑戰青年人重建人生的方向。『突破』是本地及海外畢業生文化使命承擔的表現……」其後，突破於1981年脫離了FES，成為獨立的「突破機構」，仍以青少年為對象，繼續從事福音預工的工作，突破運動至今在進行。

突破開拓時期的同工和義工，大部分都是從海外回來的。蘇恩佩當年的開荒伙伴蔡元雲醫生，從

加拿大習醫歸來，日後長期擔任突破機構的總幹事，並因突破對香港青少年工作的貢獻，屢次受政府所邀，推動和策劃香港的青少年工作，所作的是「突破運動」的延伸。蔡元雲至今仍是突破的榮譽總幹事，30多年前的異象，仍歷歷可見。上帝興起，他們回應！

燒盡生命

在突破運動發展如火如荼之際，亦是蘇恩佩飽受癌病折磨的日子，她不顧荏弱的身體，仍盡力獻上僅有的力量。自《突破》雜誌誕生一直到她逝世的那天，蘇恩佩把近十年的光華毫無保留獻上了。1982年4月11日，終因癌症不治，撒手塵寰，回歸父家。

在香港，蘇恩佩不僅催生了突破運動，也推動了很多以青少年為對象的事工，其中一項就是現時歌曲很受年青人喜愛的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(ACM)。回顧他們的成立，也得力於蘇恩佩的鼓勵；在他們的網頁裡，你可以看到這段文字：「1980年，翁慧韻及吳秉堅在突破機構所舉辦的民歌創作大賽中認識，遇上剛由加拿大回來的陳芳榮。這三位對音樂充滿熱誠、對神充滿感恩的年青人，都有著共同的『夢』，就是希望匯聚本地基督教音樂人，一同以音樂服侍各教會及佈道，並推動原創且具時代感的粵語詩歌，鼓勵及栽培更多有志的音樂事奉者。在蘇恩佩姊妹的鼓勵下，他們便聚在一起創作現代、具本土文化的詩歌。在突破機構的協助下，1982年六月出版了《齊唱新歌》第一集。隨後第二、三集分別在1983年間先後面世，同年翁慧韻、陳芳榮、吳秉堅聯同其他支持這個音樂事工的肢體正式成立『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』……」

蘇恩佩是帶著患癌病的軟弱身軀來推動「突破運動」，擴展多元青少年文化服務，包括了影音和輔導。《突破》雜誌經歷了25年的歲月，激勵了無數年青的生命，雖已完成了任務而停刊，但影響仍在。服侍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駱穎佳，在〈夏讀蘇恩佩〉(見《宣訊月刊》第42期，2003年6月)這篇文章中如此寫：「某夜，忽有所感，想讀讀蘇恩佩姊妹的舊文，企盼從這位前《突破》雜誌的創辦人，一位熱愛香港的先知的文字裡，得著觀照今日香港的立足點。」

蘇恩佩不但透過文字來影響社會上的青少年，對同工們也有深遠的影響。曾為突破編輯書籍的羅錫為牧師，在〈突破雜誌老友重聚〉(見「第一城浸信會網頁」)提到《突破》時說：「那是三十多年前創刊的一份年青人雜誌。它確實是一份年青人雜誌，因為它是由一群有理想的青年人合力弄出來的。當然還必須要有個蘇恩佩來感召、訓練及帶領他們。」現任基督文藝出版社社長，亦是《突破》前總編輯的吳思源，服務突破機構16年，他形容這段時間是他生命成長和事奉訓練的沃土。他回憶一個由蘇恩佩帶領的編輯退修會，會上不提事工，每人只帶聖經和一本 *Presence of the Kingdom*，「我們就在閱讀、細嚼、思考、交流。事隔二十多年，才驚訝恩佩姐的獨具慧眼，她要我們把事奉的焦點放在上帝國度彰顯和見證之上——我們所做的、所努力的，不是建構自己的天國；我們只是上帝卑微的僕人，見證和表達上帝的國臨在人間。」他更說，對突破給他的孕育和塑造，是感激不盡的。

在病中，《突破》與《突破少年》這兩份雜誌消耗了她全部的精神、體力和時間，連最心愛的文學創作也要放下。為著青少年，她聽通俗的音樂、去的士高，寫適合他們的文章，目的是幫助他們正視自己的處境和問題。正如余達心牧師在《蘇恩佩文集》的散文序中寫道：「假若恩佩肯『純文學』一點，她一定可以在寫作技巧方面有更高的成就。但為了服事這一代的青少年人，她的文章往往受限於篇幅，受限於讀者的接受能力。讀她的文章，常感到有一種言未盡或力求淺白平易的壓力，使她的創作才華不能如她所願的發揮淨盡。這是她付的代價。」突破出版社將她所寫的作品，包括了散文、書信、戲劇和劇本，輯錄成為《蘇恩佩文集》，共兩冊，於1987年出版。

蘇恩佩燒盡了她生命，完成了她的使命，走了！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使命，今日的時代使命，有誰來承擔？然而，她的探索和足跡，足以啟發後來者邁步與開拓！

(本文取材自：《蘇恩佩文集》突破出版社，1987出版，及互聯網頁。)